

目录

总序	张 剑	xiii
序言	许德金	xxii

第一章 概说	1
--------	---

1.1 文化与资本	1
1.1.1 文化的本质	1
1.1.2 文化城市化与城市文化化	4
1.1.3 文化资本化与资本文化化	6
1.2 何为文化资本	9
1.3 当代意义	18

第二章 文化资本：理论源流与研究现状	22
--------------------	----

2.1 文化资本理论源考	22
2.2 文化资本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6
2.2.1 国外相关研究	26
2.2.2 国内相关研究	39

第三章 关系主义视域下文化资本理论核心概念考辩	45
-------------------------	----

3.1 惯习	46
3.1.1 定义与渊源：关系主义视角下的概念重构	46

3.1.2 核心要素：惯习在“场域—资本”关系中的三重功能	48
3.1.3 文化资本的传承：惯习的关系性实践	49
3.1.4 惯习局限性与批判：关系失衡的理论张力	50
3.1.5 惯习批评的对话：从关系失衡到关系重构	52
3.1.6 惯习的制度化批评与关系主义：英格利希、吉洛里、詹金斯与布迪厄的对话	54
3.2 场域	55
3.2.1 场域的定义与渊源	56
3.2.2 场域的核心要素：关系主义框架下的三维特征	57
3.2.3 场域与惯习、文化资本：关系主义的枢纽作用	59
3.2.4 有关场域理论的批评对话：关系主义框架下的争议与回应	60
3.2.5 数字时代的场域革命：新问题与新方向	62
3.2.6 小结：场域理论的关系主义生命力——布迪厄从传统印刷媒体时代到数字化新时代	63
3.3 象征资本	68
3.3.1 象征资本的定义与理论渊源：关系主义的起点	69
3.3.2 象征资本的核心要素：与场域、惯习的耦合关系	70
3.3.3 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同质异构与 / 或异质同构	72
3.3.4 当代批评与对话：象征资本的理论张力	73
3.3.5 象征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实践机制与案例解析	75
3.3.6 当代评价与批判	76
3.3.7 象征资本的理论价值、局限与数字时代展望	78
3.4 信念	79
3.4.1 源流与定义：从古希腊的“意见”到社会学的“自然化共识”	79

3.4.2 信念与惯习的关系	81
3.4.3 信念与场域的关系	85
3.4.4 信念与资本的关系——合法性的“无形黏合剂”	86
3.4.5 信念与象征权力：隐蔽的支配机制	88
3.4.6 对话与批判：信念理论的张力与拓展	89
3.4.7 数字时代展望：信念理论的当代挑战与未来方向	90
3.5 语言资本	91
3.5.1 语言资本的内涵：关系性本质与维度解构	92
3.5.2 语言资本、象征权力与象征暴力：权力运作的 隐秘机制	92
3.5.3 语言资本、场域与惯习：实践层面的互动耦合	93
3.5.4 语言资本、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对话关系： 循环再生机制	94
3.5.5 批评与对话：关系主义框架的张力与拓展	95
3.5.6 数字时代的语言资本：新形态、新张力与新方向	96
第四章 文化资本理论经典评述：布迪厄的《语言与象征权力》	98
4.1 论著理论架构与核心观点评述	99
4.1.1 “语言交换经济”：背后的逻辑	100
4.1.2 “象征权力的社会机制”：运作机理	101
4.1.3 “象征权力与政治场域”：委托（代表）权力的 误认	101
4.2 《语言与象征权力》中主要观点考辩	102
4.3 关系主义视域下对《语言与象征权力》核心概念的剖析	104
4.3.1 语言与象征权力	104
4.3.2 语言与语言资本	104

4.3.3 象征暴力	106
4.3.4 场域与惯习.....	106
4.4 《语言与象征权力》的学术影响.....	108
4.5 《语言与象征权力》的批判与发展	109
4.5.1 《语言与象征权力》的批判	111
4.5.2 继承与发展.....	113
4.5.3 《语言与象征权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117

第五章 文学文化资本、文学评奖与文化资本社会炼金术

123

5.1 关系主义视域下的文学与资本.....	123
5.2 文学何以成为文化资本	130
5.2.1 文学价值的认定机制：赋值主体、路径与权力 后果	131
5.2.2 文学传播机制：主体、内容与权力逻辑	135
5.2.3 文学制度化：固化价值与获得象征权力的机制.....	139
5.2.4 三相动力学：文学资本化的完整链条与类型差异..	143
5.3 文学的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	145
5.3.1 文学场域的经济属性	146
5.3.2 文化生产：艺术创造与资本积累的双向互动	146
5.3.3 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学文化再生产	147
5.3.4 资本视域下的文学与文化再生产	148
5.3.5 文学文化产业化与资本化：文化产业论的视角.....	149
5.4 作为公共场域的文学：文学文化资本与文学经典的形成	150
5.4.1 文学作品“文化资本”化	150
5.4.2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文学公共场域	152
5.4.3 文学公共场域中文化资本与文学经典的关系	152

5.4.4	文学文化资本在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及其当代意义	153
5.5	典型案例阐释：世界文学场域中经典化与文化资本炼金术	154
5.5.1	莎士比亚：殖民扩张中的文化资本输出	154
5.5.2	莫言：全球文学场中的资本博弈与“祝圣”	155
5.5.3	马哈福兹与《巷弄的孩子》：非西方作家的 经典化困境	155
5.5.4	经典化的资本炼金术逻辑	156
5.6	文学文化资本、文学评奖与文化资本炼金术	156
5.6.1	文学评奖的“资本合谋”与所谓的丑闻本质	157
5.6.2	文学评奖的“社会炼金术”：资本转换机制	157
5.6.3	文学评奖的“阶级筛选”功能（吉洛里的批判 视角）	158
5.6.4	中外评奖对比：场域自主性的差异	159
5.7	文学评奖、声誉管理与文学文化资本化	159
5.7.1	文学评奖的权力结构与声誉基础	159
5.7.2	准入管理：声誉资本的基石	160
5.7.3	过程管理：声誉资本的核心建构	160
5.7.4	后期管理：声誉资本的传播与危机修复	161
5.7.5	莫言获奖后的声誉资本化路径	162
第六章 文学文化资本图景下的莎士比亚		164
6.1	莎士比亚与英国文化软实力	171
6.1.1	文化软实力与文学经典化	171
6.1.2	莎士比亚与英国国家形象塑造	172
6.1.3	教育与文化外交场域中的莎士比亚	174

6.2 文学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的莎士比亚	176
6.2.1 莎士比亚作为文学文化资本或 / 和象征资本的 转化路径	177
6.2.2 莎翁经典化与文学文化资本化过程	178
6.2.3 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文化场域中成为支配性资本	180
6.3 作为世界文学文化资本的莎翁：经典的祛魅与重构	181
6.3.1 文学文化资本：文学场域的社会炼金术	182
6.3.2 文学文化资本：一种动态模型	183
6.3.3 莎士比亚经典化和文学文化资本化的历史进程 考察	183
6.3.4 全球化教育场域中的莎士比亚：惯习与文学资本 再生产	186
6.3.5 莎翁作品的翻译与跨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的转 换与再流通	187
6.3.6 全球化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与世界文学文化资本	189
6.4 与吉洛里关于文化资本与文学经典形成的批评对话： 制度逻辑的迷思	192
6.4.1 对吉洛里关于文学文化资本和经典化过程中 “教育决定论”的批判	192
6.4.2 吉洛里文学资本与经典形成相关批评的盲点	192
6.4.3 关系主义视域下文学场域博弈的三维度模型或 三重逻辑	193
6.5 小结：莎士比亚作为英国和世界文学文化资本的反思	193
第七章 世界文化传播场域中孔子文化资本化图景	195
7.1 概论	195

7.2	关系主义视域下孔子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	200
7.2.1	作为具身化形态文化资本的孔子文化	200
7.2.2	作为物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孔子文化	201
7.2.3	作为体制化形态文化资本的孔子文化	202
7.3	孔子学说经典化与孔子文化资本化	203
7.3.1	孔子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资本.....	204
7.3.2	文化资本视域下孔子思想经典化面临的危与机.....	207
7.3.3	孔子文化经典化和文化资本化的传承之道	208
7.4	世界文化传播场域中的孔子文化资本化与跨文化传播图景.....	209
7.4.1	孔子文化物体化与世界文化遗产：体制化形态 国际可见性与再生产	209
7.4.2	孔子文本的翻译、注释与学术场域的国际再生产	210
7.4.3	孔子学院之前的孔子教育输出	210
7.4.4	孔子形象的全球媒体化与商品化	211
7.4.5	孔子文化资本在世界文化场域的多层次表现： 几个案例分析	211
7.4.6	孔子文化资本化和全球化的阻力与张力.....	215
7.4.7	小结：孔子文化复合式和网络化的全球传播图景	216
7.5	孔子思想经典化与孔子学院	216
7.5.1	孔子思想经典化的历史轨迹与文化资本逻辑	216
7.5.2	孔子世界文化资本化平台与跨文化传播图景： 孔子学院	218
7.5.3	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机制与孔子文化资本化	221
7.5.4	孔子学院的意义、价值与未来展望	222
7.6	全球化场域视域下孔子思想的跨文化传播	223
7.6.1	全球化背景下孔子跨文化传播框架	223
7.6.2	孔子思想的全球化跨文化传播路径	225

7.6.3 孔子文化资本积累的跨文化传承机制与本土化策略	226
7.6.4 全球文化场域中孔子文化资本化的挑战与机遇	226
7.7 孔子文化思想经典化与文化资本化：思考与展望	227
第八章 文化资本的理论价值与当代发展	230
8.1 文化资本理论的价值	232
8.2 文化资本理论的当代意义	235
8.2.1 场域—惯习—资本的动态调整重构及社会文化再生产机制	237
8.2.2 文化资本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的“硬核阐释因子”	237
8.3 文化资本理论的发展、批评及未来趋势	239
8.3.1 文化资本理论在 21 世纪的延展	239
8.3.2 文化资本批评与当代回应	240
8.3.3 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趋势	241
8.4 小结	244
参考文献	245
索引	262

前言

我初次接触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一概念，是在2000年我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对社会学比较着迷，就经常到社会学的课堂上蹭课，于是接触到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其文化资本理论。一年后，机缘巧合我又参加了国内一本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负责五个国外学者词条的编写，其中就有布迪厄。在编译介绍布迪厄的过程中，我对布迪厄及文化资本理论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我真正开始研究文化资本理论并将其开设成一门本科生课程(名为“文化资本导论”)，还是在2007年1月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以后。那时，我通过人才引进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其间，为了助力学院外语学科早日取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更好地服务学院外语学科人才培养，响应外语学科发展需要结合院校自身特色的大背景，作为当时分管学科发展的英语学院副院长，我和学院领导达成共识，确定了学院走跨学科的融合发展道路，即重点借助学校已有的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发展兼具经济学和商科特点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文学一级学科点，于是2011年我院就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商务外语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为适应商务外语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我从2008年开始，就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英语专业本科生用英语开设了一门颇具特色的选修课“文化资本导论”，这门课程一直持续到我2016年离开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到中山大学工作。在这期间，由于长期带领学生进行文化资本理论学习和田野调查工作，我的人才培养课堂教学工作产出不少调研成果，先后于2012年和2015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北京城市文化资本的田野调查报告，此后我便产生了撰写一本关于文化资本的社会科学学术性读物的想法。这一想法与本丛书主编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文化资本》逐渐从想法变成了今天的这本书，而这个过程足足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文化资本的概念虽然最早不是由20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但却是他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发展成一套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非凡影响力的理论，并广泛运用于教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受到马克思关于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二分法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文化资本概念还受到福柯的权力/知识、规训/身体理论，结构主义，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以及J. L. 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深刻影响，其概念和理论本身的发展就是跨学科理论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虽然布迪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更多地使用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国内亦译为“符号资本”)、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和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等概念，很少提及文化资本，但究其根本，这些新的术语都秉承了布迪厄一贯的风格：自由洒脱，随心所欲，不拘泥于具体的术语形式。布迪厄看重的是术语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力和术语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阐释力，这也是他后期提出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初衷：反思的既包括社会学的研究理念，还包括既有的术语和社会学理论，以更好地适应和解释他所在时代的社会变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culture*)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再生产逻辑和社会分层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源于他对社会学实践的元批判(*meta-critique*)，强调社会学家必须反思自身的位置(*position*)、场

域 (field) 和惯习 (habitus)，以避免社会知识(再)生产中的偏见。反思对布迪厄而言并非脱离实践的抽象思辨，而是嵌入社会实践中的动态过程和批判工具。同时，布迪厄视社会学为“实践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Practice)，这其中实践是核心：它指涉日常行动如何通过惯习和场域再生产社会结构(比如通过象征暴力)。反思性则提升实践的批判潜力，帮助揭示文化知识(再)生产中的权力动态(如文化资本如何掩盖不平等)，避免客观主义 (objectivism，即视社会为外部事实) 和主观主义 (subjectivism，即忽略结构约束) 的陷阱。实践在布迪厄反思社会学中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反思的对象(比如，考察知识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反思服务于实践，帮助社会学家介入现实变革(如教育不平等)。然而，也有批判者指出，布迪厄的这种反思可能导致主体无限自省而陷入相对主义；此外，它有时隐含规范性而非描述性道德批判，可能忽略非西方实践的多样性。总体而言，反思社会学强化了布迪厄的关系主义 (relationalism) 方法论，但需要警惕其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一开始在法国及欧洲学界反响一般。但令人惊奇的是，正如古语所云“墙内开花墙外香”，布迪厄《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及其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在一向善于吐故纳新的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为美国人文社科学界热捧。其理论不但被运用于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还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经济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这种跨域性和跨学科性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凸显文化资本论的独特理论价值。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对资本的类型采用了三分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资本”。他对“文化资本”进行了厚描，提出文化资本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或曰状态)，即具身化形态 (embodied state)、物体化形态 (objectified state) 和体制化形态 (institutionalized state)，并具体分析阐述了每一种形态的文

化资本。布迪厄在其学术生涯的鼎盛期还相继提出了象征资本和语言资本，相关概念基本贯穿在其1970年代之后的著述中。在笔者看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均为模糊的描述性术语，两者互为拥趸，交叉互补。从布迪厄自己的定义来看，象征资本显然与文化资本形成了有机组合：它既是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经过社会炼金术后转化的新形态，亦是文化资本（亦包括社会资本）在社会场域中被误认为合法或自然的一种有趣且隐蔽的结果。象征（或曰符号）资本重点指向的是文化（社会）资本的合法化状态，与文化资本具有隐形的动态关联，但并非互为包容或子集的关系。这种关系主义视角揭示了社会支配的隐蔽机制。虽然有学者认为它可能低估了当今全球化下的文化混合和抵抗（比如，后殖民语境中文化资本和数智时代数字文化资本的再挪用），但由于象征资本具有定义清晰、内涵丰富、指向明确、通俗易懂的特点，布迪厄后期对象征资本这一术语更是情有独钟，以至于冷落了文化资本。至于语言资本，它是布迪厄象征权力与象征暴力理论视域和框架中的重要组成要素。语言资本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实践中象征资本的最核心构件和工具形式——更准确地说，它首先是文化资本的具身化形态，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通过象征权力行使暴力，成为文化资本的具象化呈现（有关语言资本的详细讨论可参见3.5节和第四章）。对此，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虽然系统地为我们描绘了文化资本的理论图景，但是，要想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于不同领域来解释或阐释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或文化再生产及社会分层，还需要借助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其他概念和术语，包括场域、惯习、信念（执念）（doxa）、象征资本、象征暴力、语言资本等。正是在这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概念术语的加持下，文化资本的概念和理论才变得清晰和灵动起来，也更加具有描述力、阐释力和张力，彰显其作为文化再生产领域流行理论的魅力和适用性。为此，本书的第三章专门对布迪厄与文化资本相关的重要理论术语进行了剖析和解释，以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后期的象征资本概

念奠定基础。

有趣的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除了在传统的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至今依然一统天下，还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乃至文学领域大放异彩。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魅力，本书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专门介绍分析文化资本在反思(实践)社会学和文学领域的运用。其中第四章对《语言与象征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的经典案例评述集中探讨了布迪厄后期有关语言与象征权力的经典著述，通过分析布迪厄对于“语言表达=语言市场+语言惯习”的有趣阐释及其对于语言与象征权力的关系分析，窥见布迪厄不同于索绪尔及其所创立的现代语言学派的社会语言观。在布迪厄看来，语言是社会的，也是关系的，而非自给自足的封闭言语系统。同时，布迪厄关于语言作为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的分析论述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结合社会现实中的实例，为我们很好地阐释了语言在现实社会中是如何成为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而被合法化行使的。透过布迪厄对于语言和象征权力的阐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文化资本的语言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社会权力网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形成于市场和惯习，并参与到社会权力和暴力的合法化统治体系之中。布迪厄关于语言资本与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的经典评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资本理论的张力和具体运用打开了一道门。本书第五章以文学评奖(如诺贝尔文学奖)现象为例，集中分析探讨文化资本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以期为读者展现文化资本理论的阐释力。

第六章和第七章则分别以莎士比亚和孔子为例，为读者展示了中外两位大家作为所在国家文化资本和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在对外交流传播中如何成为所在国家文化资本发展的典型代表，并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象征资本的作用。其中第六章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作为英国文学文化资本的经典化过程。研究从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具身化形态、物体化形态、体制化形态入手，结合全球教育场域的惯习机制，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如何在英国本土及全球范围内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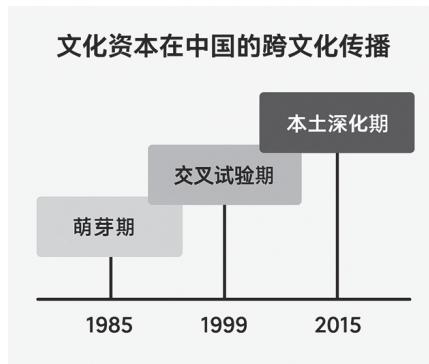
断再生产与合法化。同时，本章还重点探讨了翻译与跨文化再生产在莎士比亚世界文学文化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指出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化不仅是英国文学史内部的过程，也是全球文化资本生产和流通中的关键环节。

第七章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的理论框架，结合世界文化传播场域的视角，系统探讨了孔子文化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经典化和资本化。研究指出，孔子文化资本以具身化、物体化及体制化三种形态存在，历经经典化、再经典化、物体化等历史演变过程，在当代呈现出全球教育输出、文化遗产保护、翻译传播、商品化等多维度和多元发展态势。通过分析孔子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及其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本章揭示其在国际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孔子文化资本在全球场域内的运作机制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基于多形态文化资本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孔子文化的持续活力与全球认同。第六、七两章重在运用文化资本理论框架来阐释现实中的社会再生产现象，为读者在语言学、文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领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该理论提供新的范例。

最后简单谈谈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史。在中国学界，有学者将文化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引介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阶段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集中于对布迪厄及其相关理论的译介，缺乏本土化的实证研究；第二阶段是探索应用期（2000年至2010年），文化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文化产业等领域；第三阶段是爆发式发展期（2010年至今），文化资本理论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应用趋势。

在笔者看来，上述三分法大致符合文化资本理论在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实际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上述三阶段说略显粗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阶段之间的边界不清晰：1990年代中后期已有学者尝试在教育不平等、城乡差距等议题中应用文化资本理论，因此不能简单将这些研究归入所谓的引介期。二是“爆发式发展”这一提法过于宏观，缺乏细致梳理。事实上，自2015年以来，中国学界在文化资本本土

化方面呈现出两条明显路径：一是术语化挪用，即在研究中将布迪厄的概念作为一种修辞加以使用，但未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嵌入研究当中；二是理论化建构，即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视角或术语与中国特定文化语境相结合，形成可操作的本土化分析框架。鉴于此，笔者将中国的文化资本理论发展史重新划分如下：第一，萌芽期（约1985—1999年），这一时期以翻译、介绍文化资本理论为主，个别研究开始出现案例分析；第二，交叉试验期（约2000—2014年），教育、文学、城市研究等领域逐步引入文化资本理论，但研究方法论仍依赖西方经验；第三，本土化深化期（约2015年至今），该时期文化资本理论在诸多领域被同时运用，对我国社会文化现象、教育不公平、社会阶级分层、城市文化及文学经典化进行全面的跨学科阐释，部分研究开始从中国语境出发，试图推动文化资本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在地化，形成文化资本跨学科研究共同体。上述三个阶段具体图示如下。



但细察之下便不难发现，国内使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来厚描并阐释中国本土文化的著述大部分只是挪用或借用理论术语，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和阐释体系相去甚远。当然，这其中确有少部分学者开始运用文化资本理论进行本土化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而言，现阶段国

内文化资本研究方兴未艾，理论本土化工作小有成就，正朝着可喜的方向发展。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为文化资本理论的本土化和学术化增加一抹亮色。

本书在写作和完稿的过程中，得到了丛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李会钦社长助理、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段长城副社长、编辑王丛琪和步忱等其他相关校读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李会钦老师和王丛琪老师非常关心本书的撰写工作。没有她们的细致耐心及长期的提醒支持，本书不可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在本书成稿的过程中，湖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江教授也贡献了他的智慧，尤其是第五章有关文学评奖机制与文化资本社会炼金术的探讨分析；这部分得益于我指导他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讨论，该章中个别观点已在他以博士论文为蓝本的著作《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中有所呈现，特此予以说明并致谢。本书的成稿和校读过程得到了我的学生侯若宁、唐若蓝、彭思源、金明威的细心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是为序。

许德金

2024年10月7日草于广州愚舍

1.1 文化与资本

1.1.1 文化的本质

要探究文化、资本、城市之间的关系，先得从文化本身说起。文化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概念。不同的视角看文化，文化的含义及其疆界自然是不同的。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乃至考古学家都曾探讨文化的定义。据粗略统计，目前国内对外文化的定义已达210余种。在西方，文化更是人类学家主要研究的对象。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早在1871年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中就为“文化”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文化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义、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所获得的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Tylor: 1)¹而到了1952年，随着现代人类学的快速发展，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和克莱德·克

¹ 文中引用部分为本书作者所译，故参引括号内仍保留引用作品作者的原名。本书此类引用参照此做法，不再特别说明。

拉克洪 (Clyde K. M. Kluckhohn) 就列举了多达164种文化的定义，包括“习得的举止”“内心的想法”“逻辑建构”“统计虚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他们倾向采用的“从举止中虚构出的东西”这一界定 (Kroeber & Kluckhohn: 155–166)。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Culture and Anarchy*) 的前言中就曾这样强调和定义文化：“文化是我们走出现在困境的巨大帮助，文化是我们通过学习去寻求一切与我们相关事物的完美的追求；是这个世界所想和所说的最好的东西；也是通过这种知识探求，在我们固有的思想与习惯上注入新鲜自由思想的涓涓细流。” (Arnold: viii)

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也曾于1958年为文化下了个定义，指出“文化是生活的全部方式，包括物质、智识和精神/情感” (R. Williams, 1977: xvi)。他同时在该书中还引用了T. S. 艾略特 (T. S. Eliot) 对文化的讨论，指出艾略特将文化看作包括“一个民族所共有的具有明显特征的活动(行动)和兴趣” (转引自 R. Williams, 1977: 250–251)。威廉斯的这个定义后于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并由此广为传播和引用。后来，威廉斯又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一书的“文化”一章中专门探讨了文化的三种广义用法：“(1)作为一个独立且抽象的名词，它描述了一种智识、思想(精神)及艺术发展的总体进程；(2)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不管是笼统还是具体使用，它指向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无论这种方式是指一个民族、一段时期、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3)作为一个独立且抽象的名词，它还指向智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作品与实践。” (R. Williams, 1985: 90) 而威廉斯认为，第三种用法就是他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用法，即“文化就是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塑、戏剧与电影” (90)。

与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及其他学者所不同的是，威廉·麦克卢 (William C. McGrew) 将文化定义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知识(结果)。他

认为这个过程包括六个具体步骤，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样去定义文化过于苛刻了，尤其是对于原始文化而言，这样的定义不切实际。无论如何，他坚持认为文化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这种行为需要后天学习获得，至少会部分受到社会的影响，且因具体的团体不同而有所不同。

其他的(跨)文化研究学者，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海伦·斯宾塞-欧迪(Helen Spencer-Oatey)等也都对文化下过定义，并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洋葱”，因为他们认为文化具有层次，其各个层次间的关系就像多层的洋葱一样，每一层都影响着另外一层。尤其是在斯宾塞-欧迪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系列模糊的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而这些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规则会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阐释”(Spencer-Oatey: 4)。虽然文化“洋葱”论很形象，但其明显具有片面性：洋葱论的出发点是为跨文化交际找到理论支点，强调的是跨文化交流中“文化洋葱”最内层的作用。其问题在于：文化并非像理论家所说的那样能够进行明显的分层，而且这种洋葱论也并没有揭示文化的实质。

虽然西方对文化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都涉及如下几点：(1)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或团体的维度，换言之，文化都是与具体的民族或社会团体相联系的，不存在一种纯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虚空的文化；(2)文化既包含物质的东西，也包含精神的、经验的东西；(3)文化的概念虽然抽象，但是都要通过具体的形式才能体现出来，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一般有其具体所指，比如企业文化、服饰文化等；(4)文化与文明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互换使用，但在具体用法上，二者有所区别。简言之，文化既是人类总体物质方面的积淀，也是人类群体生活方式与生存体验的总结。

无论是上述哪种定义，采用的都是本质描述法，即定义文化本身的内涵。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来理解文化的概念，那就是逆向思考：从回答哪

些是文化，转而回答哪些不是文化。从否定和相对论的角度出发，也许我们更能窥知文化的要义。回答哪些不是文化可能比描述哪些是文化要相对容易些：答案是“自然”。如果我们以“自然”为参照系，那么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和定义文化：一切“非自然”或“人造”的东西都是文化，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由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区分文化与非文化的两大明显特征：(1)一切与人类生活、劳动等相关的事物都属于文化；(2)一切非自然或反自然的也都是文化。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反(非)自然的，这也正契合了当代中外盛行的生态主义思潮：人类创造的文化越多，就越反自然，也就越让人类日益滑入毁灭的深渊。

究其根本，西方的“大生物链”理论，虽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本质上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其立足点在于人类自身，即以为自然或宇宙的中心，而非把人类放到大自然中，并当作大自然中的一根链条去看待人与其创造的文化。这些思想在当代的生态主义者，尤其是所谓的“深度生态学者”(deep ecologist)看来，都是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只有摈弃，才能最终挽救处于文化，尤其是后工业城市文化泥坑中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社会。

1.1.2 文化城市化与城市文化

随着人类由原始社会步入封建庄园及其奴隶制度，再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文化也由原初的部落或氏族文化逐渐过渡到封建庄园文化和现代的城市文化。某种意义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诞生，并直接导致现代城市乃至现代大都市的诞生。文化在人类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中也越来越城市化，并呈现多极文化分化的现象，出现了所谓的“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市民文化”与“高层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的区别，亦即布迪厄所说的“区隔”(distinction)。文化正是随着人类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而日益依赖于城市，亦即越来越城市化，并成为城市化的必然

组成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可以称为现代城市文学。城市相对密闭和自主的文化空间成为文学绝佳的写作场域，对城市的书写与描摹无疑也就成为现代西方文学的主旋律，称其为城市文学应当并不为过。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城市及其独特的文化现象：索·贝娄(Saul Bellow)笔下的芝加哥、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 Baudelaire)笔下的巴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都柏林、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说中的伦敦，等等。文化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人类科技进步、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失却了土地的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靠进入各种产业打工生存；越来越城市化的人们，只能聚集在自建的犹如坟墓般的城市堡垒中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的城市化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或然。

如果说文化城市化是一种或然中的必然，那么城市文化则是一种必然中的或然。随着20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城市涌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于是众多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成为现当代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城市发展的特色及内涵也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城市要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独特的城市文化作为支撑，没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城市就如没有自身特色的个体一样，是不会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也更不可能有所发展；于是城市的文化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中的或然。城市文化的建设及其内涵式发展就是城市文化化的最好体现。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两极分化的景象：有的城市文化化追求的是在保持原有城市文化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建设；而有的城市文化化秉承的却是“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原则。城市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许多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如北京的首都文化、南京的金陵文化、重庆的巴蜀文化、青岛的啤酒文化、底特律的汽车文化、洛杉矶的好莱坞文化、戛纳的国际电影文化，等等。城市文化化的独特景观在中西文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再现：纽约、伦敦、都柏

林、上海、北京、香港、巴黎，等等，都能在现当代中西方城市文学中找到各自城市文化的缩影。

有趣的是，文化城市化和城市文化并非让每一位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感到舒心和满意，而是往往让他们既恨又爱。一方面，被誉为现代派鼻祖的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就把他赖以成长的欧洲大都市巴黎当作抨击的对象——例如在其作品《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中，波德莱尔对巴黎城市文化的阴暗面和畸形的社会文化现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挖苦，以抒发作家的愤懑不平；另一方面，波德莱尔又对当时作为欧洲艺术圣地的巴黎城爱不释手，以至于后来他在去印度远行的路上出于对巴黎城市文化的眷恋而中途折返，从此很少离开巴黎。波德莱尔对巴黎城市文化的热爱与眷恋也可以从他的上述两本诗集的部分诗篇中窥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的城市文化给了波德莱尔艺术生命和创作的源泉；而现代文化城市化的丑陋同时也让从小丧父的波德莱尔原本孤独、消极的浪漫主义情怀进一步加强，也使他对巴黎这座光怪陆离、放荡不羁的城市怀有极端的憎恶之情。爱与憎在作家内心的交织最终催生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葩——《恶之花》。

1.1.3 文化资本化与资本文化

在文化进入城市、城市热烈拥抱文化并不断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资源，如同其他稀缺资源一样，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益资本化。换言之，原本非功利的、抽象的、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的文化也在资本主义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驱使下功利化、物质化、具体化和资本化了。可问题是：文化到底是如何与资本勾连并成为资本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从法国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说起。

孔德认为资本起源于人类劳动，当产出大于消费时，多余的产出便会积累起来，并代代相传(转引自Gouldner: 25)。孔德在《实证政治体

系》(*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中指出：“资本积累源于劳动分工与集体中的联合行动，通过世代传承实现。”(Comte: 131) 在该著述中，孔德首次将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结合，其跨学科研究路径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正如中国学者在符号学论坛上指出：“孔德继承人类学广义‘文化’概念，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交融，形成文化资本观念的最初萌芽。”¹ 尤其是其提出的“耐用性资本”的概念隐含了(文化)物质资源的长期积累特征，可视为文化资本观念的萌芽。这种解读和理论引申具有一定的学术溯源价值，但必须指出的是，孔德有关资本的相关论述仍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并未关注文化符号/象征的权力属性。相比之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的突破在于，在其著作《区隔：判断力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下文简称《区隔》) 中，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尤其是“体制化形态文化资本”(比如学历) 定义为“将个体能力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象征或曰符号资源”(Bourdieu, 1984: 248)。布迪厄所谓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即体制化形态文化资本，有力揭示了“趣味”的文化属性和阶级属性及其社会再生产的区隔功能。由此可见，孔德与布迪厄有关资本观点的关联更多体现在跨学科的方法论层面，而非概念或含义上的直接继承。阿尔文·古德纳 (Alvin W. Gouldner) 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第五章“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中指出，知识分子通过控制教育体系和知识生产，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继承的“符号资本”，这种转化过程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他还特别提到：“新阶级作为文化资产阶级，其权力基础在于对历史积累的文化资本的私人占有。这种占有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如图书馆、实验室)，更体现在符号层面——通过教育证书、学术头衔等制度化为排他性的社会资源。”(古德纳: 45) 简言之，古德纳在该著述中认为，

1 此为中国学者在2023符号学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通过垄断文化资本（如教育、技术知识）形成“新阶级”，其本质是将历史积累的集体文化资源转化为私人占有的资本形式（38–52）。古德纳认为新兴小资产阶级将文化共有圈作排他性私有的看法，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有关阶级和阶层品位区隔的相关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的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形成了有趣的共鸣。但需要指出的是，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仍然存在本质区别：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象征权力（暴力）和场域及惯习逻辑，而古德纳更关注其作为社会统治基础的物质性（如经济收益、代际传承）。古德纳强调资本是对文化的私人占有的观点可以视作其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批判性重构，而非对布迪厄理论的隐喻性用法。

继孔德、古德纳之后，布迪厄历经十几年对阿尔及利亚及法国教育再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再次指出，资本是社会内在规律的潜在原则。资本同时是积累的劳动，其积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并能产生利润。资本的各种类型与子类型的分配结构正代表人类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他认为，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理论中的资本，然而资本这种一向被视为十分“物质”的事物，完全可能以非物质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出现——即文化资本化。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虽不会直接转变成金钱，但却可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产生利润。他坚持认为文化与经济上的资本有一些共同点，并特别表明文化“习惯和倾向”（habits and dispositions）构成能够产生利润的源泉；它们可以为个人或团体所垄断，并在适当的条件下代代传衍。

与马克思的资本二分法所不同的是，布迪厄认为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文化资本也是其中的一种。在《教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的独立篇目“资本的形式”中，布迪厄指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又探讨了一种新的资本形式：象征资本。在布迪厄看来，资本通过在场域中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而发挥效益，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他还认为，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

可以互相转换 (conversion)，转换的比率随场域条件而发生变化。然而，布迪厄没有囿于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本，而直接转向尚未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开垦的文化领域。他认为，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往往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体制化的。

1.2 何为文化资本

20世纪后半期，布迪厄首次提出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早期主要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尤其是西方社会知识和文化的再生产，是20世纪后期社会学研究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多用于剖析和解释西方尤其是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开始流行于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以来，其应用的领域逐渐扩大，从社会学、教育学延展到经济学(尤其是产业经济学)、文化研究、哲学、人类文化学乃至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资本理论更是成为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的宠儿，其重要性和研究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文化资本理论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布迪厄在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的基础上，结合其自身在法国殖民地的教学研究经历及其本人对20世纪中期法国教育领域知识与教育再生产状况的观察，对资本的形式进行了再思考，并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二分法拓展为三位一体的新分法，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的三分法并未严格遵循马克思意义上的分类准则，因为在布迪厄看来，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相互转换，这从他早期对《资本的形式》一文的论述中可见端倪。在布迪厄的资本体系中，文化资本是其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他对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学领域最卓著、最耀眼的贡献。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体系里，文化就是一种资本，是可以用来获利的工具；文化

资本直接参与知识和文化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既是文化的一种工具，也是文化用于逐利的一种显著表征。文化资本既是具有文化的符号表征系统，也是具有资本的获利体系。它是一种象征性极强的资本形式，具有不断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能力。要想深入了解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我们就不得不从文化的源头说起，首先回答诸如“文化”这种看似高雅的东西如何同“资本”这种罪恶的东西勾连起来这样的问题。

到了20世纪初，人类文化(或曰人类文明)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尤其是发达的西方社会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时代，其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城市以及与之相伴的城市产品(文明)的出现。而伴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更确切地讲是郊区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及城市文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外作家，尤其是西方作家文学创作的视阈，并一度成为西方，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现代及后现代作家或讴歌或鄙夷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城市化及城市文化也成为那个时代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建筑学家，乃至科学家竞相关注的对象，其结果就是：城市化及城市文化成为现当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研究学者及社会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

但美中不足的是，虽然雨果、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托尔斯泰(Leo Tolstoy)、F. S. 菲茨杰拉德(F. S. Fitzgerald)、贝娄、乔伊斯、狄更斯、波德莱尔、张爱玲、林语堂、钱锺书等诸多中外文人都曾用其生花的妙笔对现代城市及城市文化进行过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描画，但在文学及文化批评研究中，城市化及城市文化只是传统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的背景材料。在诸多的批评家和研究家的眼中，城市及其所独有的文化只是为作品中人物的刻画或情节塑造服务的。即便是盛行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的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评，其所关注的焦点也仅限于文化消费主义及大众文化的传播，却忽视了城市与文化、文化与资本、城市文化与资本等多维向度的互动现象。前文已经从文化的本质出发，抽丝剥茧地揭

示了文化与资本、文化与城市、城市文化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将聚焦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并将其置于一个多维度、立体的透明玻璃球中进行观察，以此解开文化何以成为资本的斯芬克斯之谜。

就文化资本化问题，布迪厄简单总结并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具体形态：(1)具身化形态文化资本，指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形式；(2)物体化形态文化资本，指以文化商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的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形式，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3)体制化形态文化资本，指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存在，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在《理解布迪厄》(*Understanding Bourdieu*)一书的第七章中，詹·韦布(Jen Webb)等学者这样解释布迪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一种与文化正统趣味、消费模式、社会属性、技能和荣誉相关的价值形式，例如，在教育场域中，学位(学术资历)即构成文化资本(Webb *et al.*: 127)。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一种典型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是个人经过不断学习逐渐积累起来的资本，与个人的资本密不可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文化资本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即个人文化资本与家庭、学校及高等教育体制潜在的密切关系)。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自从其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理论之后，文化资本论就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学乃至地理学、生物学等领域，在教育再生产、文学与文化经典形成等研究中均随处可见文化资本论的身影。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布迪厄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论到后来学者将此理论挪用到教育、文化及其他领域，文化资本的“私有性”一直存在并被强调。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认为，文化变成资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被私人占有，而且拒绝为那些缺乏文化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

(Gouldner: 19–21, 28–31)。因此，在国外，无论文化资本理论扩展到哪个领域，该理论都以强调文化资本的私人累积性为出发点。

虽然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化在教育领域的积累过程和转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但他对于文化到底是如何成为资本的问题仅仅给出了部分且模糊的答案。布迪厄所揭示的是文化资本化的过程及其形成机制，而没有直接回答和探讨文化缘何能够成为资本。而且，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类型学研究也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仅是一种直观的观察与感受，这导致文化资本的三种亚类型虽有差异，却有所重叠。还有，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体系也存在着重质性研究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量化研究的问题，这直接导致文化资本理论仅具有理论建构价值，而缺乏可操作的衡量(评估)体系的有力支撑。

最为关键的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只关注了法国等几个有限国家教育领域内的文化向资本的单向运动，而没有看到资本向文化的反向运动，即笔者所说的“资本文化化”，文化与资本的反向互动也因此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笔者看来，缺乏对资本文化的讨论才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最大不足。所谓“资本文化化”，是指资本要想获得更大的利润和可持续发展而依附于文化，与文化融为一体，并通过文化载体获取更多的收益。只有借助文化这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形式，资本才能将收益最大化，获得可持续发展。正是认识到资本文化化的巨大经济价值，西方发达国家才在20世纪后半期加大了资本文化的力度，借着全球化的援助，打着经济投资的幌子贩卖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资本文化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殖民和文化同化，最终西方完成了经济殖民与文化殖民。在当今技术主义至上的AI时代，西方借助人工智能和网络霸权，以资本为媒介深度渗透文化网络，从而推动其主宰的霸权文化在他国异质文化中迅速生根发芽，并催化出所谓的“文化革命”。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20年间世界各国发生的多次“颜色革命”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资本借助先进的技术实现了对异质文化的隐形控制和文化霸权，今天的利比

亚、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借助互联网融入他国文化，实现文化霸权的例证，资本文化化的作用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就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20世纪末西方学界出现了以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鼓吹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理论学派。

其实，对于文化的资本属性以及文化商品化、文化大众化和文化资本化的现象，许多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化研究学者都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如20世纪颇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商品化、大众化和资本化进行过批判。总体而言，阿多诺对文化商品化和大众化持否定和抨击态度。他认为文化应该是人类高雅的思想和艺术活动，不应该商品化、大众化和庸俗化。同时，阿多诺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化、文化大众化以及文化商品化是工具理性和庸俗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虽然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体系里有专门针对文化的深入讨论，认为文化可能成为将人类经验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工具，但正如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所言，阿多诺却义正词严地拒绝讨论大众化文化是否也存在这种可能。他公开批判大众文化重复生产且千篇一律，只有为市场化和满足个人的消费需求而做的些微改动（Gunster: 13）。欧洲另外一个著名的现代主义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也曾明确反对人类艺术的商品化。

本雅明的观点与阿多诺和卢卡奇反对文化大众化和文化商品化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本雅明和阿多诺有着这样的共识：商品化的形式（即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化）对人类的批评思想和行动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会严重损害人类获取经验的能力，但相比之下，本雅明更愿意直面文化资本化、大众化和商品化的严重后果，也更愿意对资本主义摧毁人类传统的经验与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能后果进行乌托邦式想象。他对新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传播技术很感兴趣，并认为这些用于文化大众化的新技术，比

如电影，可能会为人类打开新的经验的大门，可能为将来的社会集体大变革奠定基础（Gunster: 14）。虽然本雅明对资本主义于文化的作用也持悲观态度，但他却能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和接受文化的大众化、资本化和商品化，并从内心深处期盼从资本主义文化的商品化、大众化及资本化的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中召唤出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革命美学。

同时，本雅明还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文化空间特别敏感。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辗转在欧洲许多城市生活过：柏林、法兰克福、巴黎、马赛、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莫斯科，等等。本雅明敏感、悲观、多愁善感且特立独行，善于洞察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对于人的异化，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大众化、商品化和资本化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与阿多诺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本雅明不同于后者之处在于他被动接受的能力，在于他否定之肯定的辩证哲思，在于他积极的浪漫主义情怀。本雅明曾经这样评价他与挚友阿多诺的分歧：“在我看来，我们各自的研究，就像设定好从相反的方向照向同一物体的两盏头灯，以一种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过，更加彻底、新颖和更加有意义的方式，来揭示当代艺术的轮廓和特性。”（转引自 Gunster: 14）

上面我们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述，现在是直接回答本节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了：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缘何成为资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文化与城市是共生发展、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回答文化何以成为资本的问题也就是直接回答城市文化如何成为资本的问题。

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首先是因为它与资本之间具有许多共通性。第一，文化是人类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第二，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具有不一致性，有着各种亚文化的差异；第三，文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由人类后天创造、后天习得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

而资本的特点则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得以窥见。马克思对资本的形式、内涵、特点、规律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和揭示，认为资本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可以由各种形态表现，但不论以何种形态表现，资本必须具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虽有价值但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都不是资本；其二，资本是一种运动，资本必须不断运动，只有通过循环周转，资本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其三，资本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范畴。

比较之下，我们便不难发现文化与资本有如下的共同点。首先，两者都可以积累和进行社会再生产，并可以代代相传。经济资本通过“金钱”这种显著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而文化资本则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多种后天的学习方式不断传承给子孙后代。其次，两者都可以产生利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日趋火爆的各类“民俗风情游”其实就是利用文化来赚钱。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今天，人们逐渐开始重视文化的含金量，钱也要花到“文化”上，以免有庸俗、铜臭之嫌。于是各地纷纷开发带有本地民族风情、历史传统等特色的旅游资源，在满足人们虚荣心的同时获取经济效益。第三，两者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文化需要一直发展，才能越积累越多。通过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文化不断生产出新的文化产品，同时扩大文化自身的内涵。以历史遗迹为例，在未开发前，历史遗迹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只为历史学家等少数人了解。当文化被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利用后，其文化内涵渗透到历史学家之外的旅游者身上，被更多不同的群体所了解和享受。更重要的是，被开发后的文化内容不断得到延伸，隐藏在遗迹背后的故事、精神、态度等风俗习俗不断被挖掘，其文化影响不断扩大。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家庭文化资本（“习惯和倾向”）的积累可以使孩子在前期教育和学术场域中收获教育的红利，后期则在就业市场占据有利地位，以就业市场的高工资和高回报体现文化资本的红利。也就是说，家庭所占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则后期资本的各种形态转化率就越高，利润或红利也就越大。

当然，文化资源是通过多种途径转化成为文化资本的，不同场域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方式和比率亦有所差别。文化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无统一定义。国内传统的解释是，资源即财源，是资财之源。广义而言，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然界赋予的自然资源，二是人类社会劳动创造的各种资源。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或可利用的各种资源，也可以分为文化自然资源和文化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是文化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如大理石、玉石等都属于自然资源，是进行雕塑、篆刻等文艺活动的基础；同样，一些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是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前提，离开了这些自然资源，一些文化生产就成为无米之炊，只能是空想。社会资源是文化资源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艺、道德、法律、风俗、信仰，以及其他后天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等。然而，资源本身并不是资本。资源进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作用，产生效益，并获取相应的回报，才成为资本。

简而言之，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首先是因为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其他资源所无法替代的、另类的稀缺价值 (scarcity value)；其次，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还因为它从来就不是抽象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总是以某种具体的形式存在，并以某种方式在人类社会中传承下来，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最终能够以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方式为其持有者带来剩余价值。换言之，文化是能够带来某种“利润”或“价值”的东西。

不同于经济学上所讨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亦包含布迪厄后期常用的另一个相类似的术语“象征资本”)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文化与资本的结合虽然显得有些诡异，但文化资本的资本属性十分明显，后面我们提出的“文学文化资本”概念亦会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当然，文化资本的独特性也直接决定了其“回报”，或曰“红利”的独特性：文化资本带来的收益并不一定是赤裸裸的金钱或经济资本，更多的时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间接社会效益，如名声或个人荣誉，布迪厄将

其称为体制化形态文化资本。而这些看似另类的回报最终还是会以某种直接的经济收入为其持有者带来更持久的利润，转化为一种比经济资本更持久、更绿色，也更有“钱”途的资本新形态。这也是为何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以美、英、法、德为首的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本国文化资本，将其视作国家软实力的主因。作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结果，城市文化同时也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资本属性不言而喻。城市文化能够成为资本的全部奥秘存在于“城市—文化—资本”三向永恒的互动之中。

理论上说，文化可以成为资本，其所形成的文化资本应该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且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自19世纪中期以降，现代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现实是：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绿色”的资本，而是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陪衬与点缀，比如我们常能听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话语或标语。如此一来，文化已事实上沦落为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争相哀号或奚落的对象，成为与自然无关、形而上和没落文明的代名词。正如贝蒂·罗斯扎克(Betty Roszak)与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¹，整个人类的哲学及美学运动一直预言甚或致力于我们与自然分离异化，好像这就是人类必然的处境”，“现代主义的实质是越来越浸淫于各种极端的绝望、焦虑甚或直接的犬儒主义中。主流艺术偏安于时髦的痛苦或犬儒主义，故步自封于一种已经失去或遗忘了生态之根的文化——城市文化”(B. Roszak & T. Roszak: 20–21)。

当然，笔者以为，现代的城市文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都市)文化如此不堪，既不能全赖到“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现代派艺术家的身上，也不能笼而统之地归咎于市侩的人类实用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主义至上，以及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

¹ 作者注：这里指的是20世纪。

人类实用主义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才是造成现当代城市文化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地球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困顿让越来越多的作家与评论家日益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再也不能如此下去。它需要而且应该绿色、生态、自觉。只有这样，文化才能突破城市的藩篱，打破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桎梏，在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互动中真正成为资本，也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文化生态愿景。只有如此，文化才能拒绝成为配角，为城市文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生态整体乃至整个自然生态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新世纪生态文学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角。

1.3 当代意义

自布迪厄系统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以来，文化资本研究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重要的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AI异军突起的当代，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及意义愈发凸显，文化资本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愈发深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文化资本与当代教育问题。在当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文化资本的主要社会传递机制和路径。尤其是在AI技术盛行的当下，当代AI的相关教育已成为家庭和社会公共教育的主要指标体系及家庭和社会文化资本传承的晴雨表。个体通过家庭和社会教育体系所传承和占有的文化资本决定了该个体此后在社会教育和职业场域中能否获得成功。当下，文化资本不仅影响个体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对教育体系自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深入研究文化资本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教育场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推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教育制度更加公正、包容地发展。

2) 文化资本与当代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是在社会领域尤其

是在文化场域中的一种新型资本。文化资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文化资本与当代社会阶级的分层关系密切。在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看来，文化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当代文化资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机制，推动社会阶级分层和社会流动性研究和实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资本并非局限于特定的社会场域，相反，它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进行传递和有效转化。文化资本的跨场域传承和转化一般来说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流动性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文化资本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中个体多元融合的发展路径。

3) 文化资本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资本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特殊要素，可以直接反映个体所属的文化群体和社会背景。总体而言，文化资本可以帮助个体塑造身份：个体的文化资本不仅影响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还能直接推动个体的身份认同。通过文化资本研究，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个体如何通过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来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

4) 文化资本与当代科学技术。我们已进入 Web 3.0 和 AI 主导的新时代，文化资本的传承和转化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变革。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资本在“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跨越式和融合性传承与转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研究 AI 时代的文化资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前沿。在 AI 时代，尤其是 ChatGPT 已进入 5.0 时代，文化资本在 AI 主导下的网络空间中的传承、转化和表达已经成为塑造个体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研究 AI 时代的文化资本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网络文化对个体文化身份，尤其是虚拟空间身份认同的影响。

5) 文化资本与跨学科研究。文化资本研究需要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教育学、哲学等。从多元视角展开对文化资本的研究能够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文化资本的复杂性、融合性和多样

性。同时，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当代社会相互交织，共生共荣，从融合的视角对文化资本进行跨学科的关系研究（*relational studies*）有助于揭示当代社会结构和个体生活的关系全貌，因此，文化资本的跨学科融合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6) 文化资本与社会演变。文化资本对社会变革具有引领作用。研究文化资本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群体、各阶级与各阶层之间的互动，为当下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培养个体更广泛和更丰富的文化资本，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为不同场域的公众提供更加公正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文化资本研究同时也为我们当代的社会教育改革提供思路和启示，如通过凸显在教育中培养个体多元文化素养，使其占有更多文化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动社会实现机会均等。

总之，文化资本研究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揭示社会结构和个体生活中文化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和关键作用，同时也为教育等社会场域中的社会流动性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实践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文化资本理论也为我们理解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通过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资本的分配和流动，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全球社会结构，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在多元的当代社会，文化资本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文化资本如何在全球语境下塑造身份认同，有助于理解个体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变化。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全球化和AI技术的传播，让当代的社会文化再生产与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和不可逆的变化：数字化时代在为文化再生产与全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带来了重大变革。研究文化资本在数字化时代尤其是AI时代的新动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社会文化艺术再生产的特点和规律。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文化资本研究会更加强调跨学科融合。文化资

本理论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可以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文化资本的多面性及其与社会变革的密切关联。尤其是在全球化、数智化大背景下，应该发展国家文化资本，通过文化资本国际化引领社会变革，促进国际社会的包容性和公正性。同时，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教育体系的优化建议，促进更多人获得和积累文化资本，缩小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文化资本理论为制定更加公平、更为包容的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助于推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进程。当前，全球化也为文化资本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融合的契机，而文化资本的新时代发展也为我们深刻理解AI时代社会空间的发展变革、教育体系和文化领域的绿色革命，尤其是文化再生产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